

蒋星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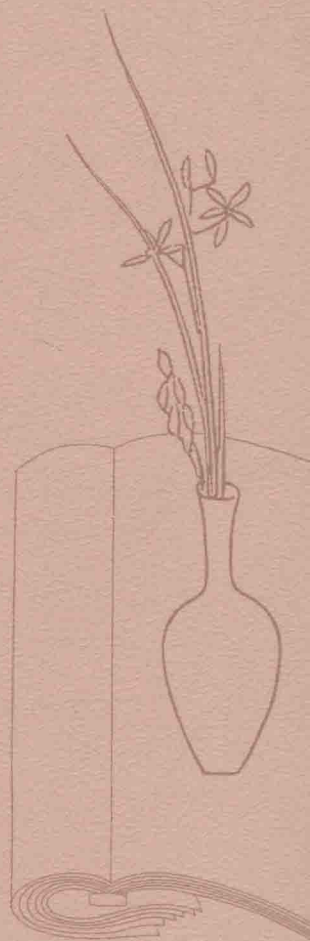
第三卷

《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

蒋星煜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星煜文集. 第3卷,《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蒋星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621-4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蒋星煜—文集②《西厢记》—文学研究 IV. ①C53②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8468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周 珍

封面设计 王小阳

蒋星煜文集

——第3卷 《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

蒋星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29.5 插页 40 字数 4,900,00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621-4/Z·188

定价 980.00 元

(全八册)

蒋星煜文集

第三卷

《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



1990年夏，蒋星煜在上海文联上海文学艺术院讲《西厢记》，由该院常务副院长郭青主持



蒋星煜分别在北京、上海、台北、东京出版的七部《西厢记》论著



1986年，（左起）吕薇芬、周续赓、蒋星煜、胡忌、洛地、李晓在山西永济普救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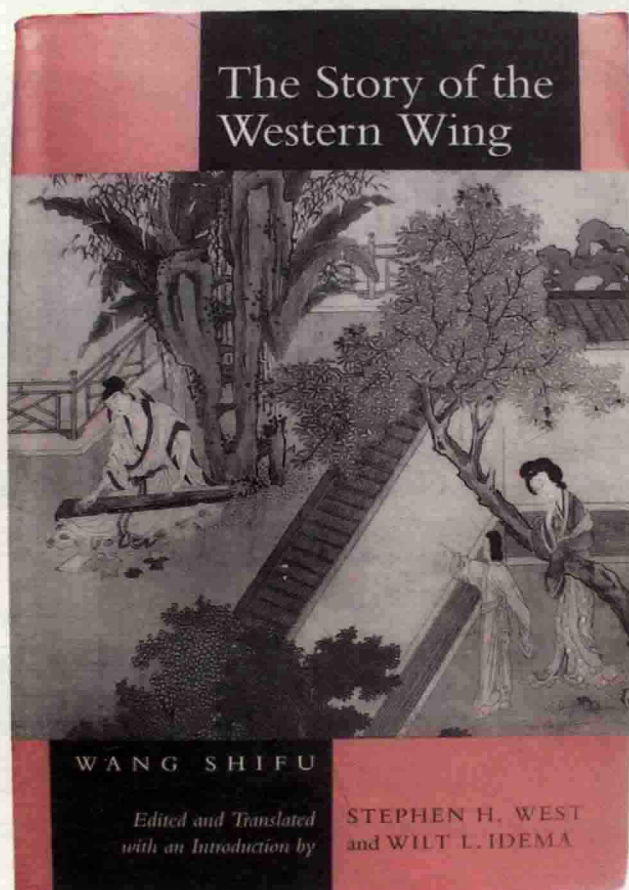
1987年，北京西厢记学术研讨会闭幕时留影，前排左五起依次为：张庚、郭汉城、马少波、蒋星煜

一本崔之東下
有牆字刪一作
株

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論情詩以亂之。不然則
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
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
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
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
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
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
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賤。召我矣。爾爲
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



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莺莺听琴》



英译本《弘治岳刻西厢记》

代序

上海解放初期，我曾同蒋星煜同志一起在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工作。后来他去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华东大区撤销后又回到上海。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已相识十余年了，但说来惭愧，我只知道他爱好《西厢记》，却从不知他对《西厢记》的版本有如此博而深的研究。粉碎“四人帮”后，他一篇一篇地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明刊本《西厢记》的文章，使我大为惊异，也为他的艰苦劳作深深感动。

《西厢记》我是喜欢的。但是版本学我是百分之百的外行，毋论《西厢记》的版本，更毋论《西厢记》的明刊本。星煜同志这些文章，我只读过极少一两篇。现在全书的清样摆在我的面前，我又翻阅了两三篇，实在不敢不懂装懂。因此，对于这本论文集的学术价值如何，见解是否新颖、深刻、正确，我难以置一词。赵景深老先生是这方面的前辈专家，我相信他对本书的判断和评价。附带说一句，我同赵先生十多年不相见了，我为星煜同志能够得到他写的序言而高兴，更为赵先生以如此高龄，还这样细致、慎重地审读星煜同志这些文章，写出很有分量的序言，感到由衷的敬佩。

我虽然对版本之学是个盲人，但丝毫不敢轻视这门学问。版本学对古籍的整理、理解、探讨上的作用，它同文学史研究的重大关系，我还是知道的。这也许是一门比较冷的学问，而专门研究《西厢记》的明刊本，更可能被人讥笑为钻牛角尖。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之可贵，星煜同志努力的价值，正在于偏要进冷门，偏要钻牛角尖。我们知识界常常有一窝蜂的习惯、凑热闹的风气，对于许多不为时尚所好，不被人们注意的偏僻角落，往往漫不经心甚至不屑一顾。因之研究马尾巴的功能就成为电影耻笑的对象。其实，抓住一个冷僻的、也可能是很小的题目，默默无闻地抠一辈子，皓首穷经，不求闻达，只在学问大厦的工地上添一砖片瓦，我以为这是极

可宝贵的努力。这正是人所应有的一点“精神”。真正对马尾巴的功能有深入研究,有所发现,有所总结,这对于认识马、利用马,有什么不好?这是说真话的科学,不是说假话的电影。

还有一点我以为更应当告诉读者。星煜同志,对明刊本《西厢记》这个不大的题目,不仅钻研了二十多年,而且是在十分艰辛的逆境中钻研的。星煜同志是明史专家,曾经写过《海瑞》传记,在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编演《海瑞上疏》的过程中曾贡献过不少力量。也正因此,他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等最早开刀的对象之一。他被戴上“反共老手”的高帽子,经过了十年的煎熬。他的多病的老伴受不住风霜雨雪之苦,在他最需要相煦相濡之时撒手长逝,弃之而去。在这种可以使人万念俱灰的境遇中,星煜同志在精神上并没有垮下来,他也许不是坚决地抵制、抗争的英雄,他也不敢偶语甚至腹诽;他只是在诚心诚意地“检讨”之余,还在默默地想他的明刊本《西厢记》。他紧紧抱住他的“才子佳人”念念不忘。这也许是微不足道的虫豸式的挣扎,然而那精神是顽强的,是做学问的人所应该有的顽强。没有这种顽强,他不可能写出这二十多万字的考证、研究文章。没有这种顽强,他的生命也将没有支柱。

星煜同志的论文,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一些尚可讨论之处,但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有贡献的,星煜同志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有价值的。

刘厚生

1981年10月

前言

在我的青年时代,学术研究方面,比较侧重文化史与明史,对于古典戏曲,仅仅是一个一般的读者,偶尔涉猎。但对《西厢记》与《桃花扇》兴趣最为浓烈,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49年以后,由于到了戏曲工作的岗位上,业余的研究工作自然免不了向古典戏曲倾斜。1953年,我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工作,秘书长伊兵要我对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西厢记》剧组作一次辅导报告,这样我才把研究心得整理成一份讲稿,开始觉得自己对许多问题都没有接触,不够深入,更欠全面。辅导报告的任务完成以后,我又再三再四地阅读原著,阅读有关《西厢记》的论著,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些主要观点。

到了60年代之初,上海市文化局委托上海戏剧学院先后开办了戏剧文学的研究班以及编剧、导演、舞美等大专班和进修班,我都在班上讲了《西厢记》,基本上是三个上午或四个上午。学员的水平高了,提出的问题虽不多却是有一定质量的,使我的思路有所开拓,研究的领域也随之而宽广起来,但仍没有想到写《西厢记》的论文或专著。

在阅读方面,甚至作为课本教材,王季思先生的注释本我可以用,但在理论探讨方面和版本考证方面,郭沫若和郑振铎先生的文章都不能解决问题。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发表较早,仍停留在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主题分析上。郑振铎先生虽然已接触了大量明刊善本《西厢记》,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是诗、文、词、曲、小说与文论齐头并进地进行研究的,没有时间深入《西厢记》这个宝库,而版本考证又是要凭功夫去细细比勘的,所以他的成就也有限。突出的成果也有,那是戴不凡兄的《论崔莺莺》,他把王骥德、金圣叹、毛大可三个批校本中的崔莺莺作了比较,认为毛大可本最忠实于王实甫的原著。这本书给我不少启发,觉得值得

进一步研究。应该研究的问题有一大堆，自己能解决的实在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我时时有写论文的冲动，却仍未动笔。那时忙于琐碎的业务，诸如与剧作家讨论提纲、剧本初稿等等，根本没有时间定下心来去搜寻、比较、考证《西厢记》的版本。

十年动乱时，“四人帮”对所谓“封资修，洋名古”的尖锐批判和批斗，使我只能暂时中止对《西厢记》的一切研究活动。但哪能就此与《西厢记》决绝呢？不可能。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起当时“虽然身在牛棚猪圈，或在工厂的反应锅旁，还是常常想起普救寺的溶溶月色，想起‘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千锤百炼的佳句，想起‘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所烘托出来的苍茫暮色中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离愁别恨”。情况确实如此。剧本的框架结构如何？人物性格的发展又如何？内心深处，不时引起波澜。这是内心的思想活动，并不反映到白纸上而出现黑字，所以造反的“英雄”们也无从对我进一步加罪。

“文革”一结束，我二三十年来关于《西厢记》各方面的研究心得和思考所得迫不及待地迸发出来，1979年底起，每年所发的论文达十万字以上。到1984年才开始放慢速度，研究的内容也不再偏重文献学，而同时兼顾到文艺学了。

由于我一开始便没有局限于戏曲论著中去发掘材料，去搜集论据，我在青年时代便养成了经史子集都有兴趣浏览的习惯，对明代较少见的野史和诗文集更是爱不释卷，使我在研究文史哲的任何专题时有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在研究明刊本《西厢记》时也能够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胡适曾强调“为学如造金字塔”，要求基础打得宽阔而坚实些，我在研究《西厢记》的工作中也深有此感受。如果我仅仅依靠《中原音韵》、《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仅仅依靠不同的明刊本、清刊本《西厢记》，许多收获和成果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和成果主要是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比较具体地介绍了现存所有明刊善本《西厢记》的版本，并清理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如周宪王本、碧筠斋本、朱石津本三种现虽散佚，但能证明确实存在过，而且某些现存的版本还或多或少有着这些版本的遗迹。如顾玄纬本，亦已无存，但亦确有此书，推测今存《会真记补

编》即为其附录。金在衡之《西厢正讹》一书亦已无存，但从明刊诸善本之批注、校勘文字中可以了解此书之大致轮廓。

把现存的李卓吾本、徐文长本均列述其各版本之特点，对其中某些刊本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窦。因为无论李卓吾本、徐文长本均在五种以上，笼统地提是极不科学的。同时指出《羊城佑卿评本西厢记》不具备任何徐文长本的特点，是贗品无疑。而金陵师俭堂刊《汤海若评本西厢记》托名汤显祖，其评论文字全是李卓吾的原文或从李评本《西厢记》中搬来，有的曾加以改写而已，实际上也是经过特殊包装的李卓吾批本。

明代龙洞山农与王骥德所推崇的明刊顾玄纬本、金在衡本、徐士范本三种善本，前两种清人已经极少提到。徐士范本在清代宣统年间刘世珩刊行《传剧汇刻》时曾看到，将近一个世纪已音讯杳然。我查访到此书后，乃写长文作了评述，并将世人迄未寓目的此书徐士范原序以及弁于卷首的程巨源《崔氏春秋序》摄制书影，一并公之于众。另一重大发现为朱素臣之《西厢记演剧》，此书不见于任何藏书家之目录或笔记，而校刻之精美实属一流。不仅是《西厢记》这一瑰宝继承、发展的珍贵见证，也是朱素臣生平及交游的难得史料。本来人们只知他是《十五贯》的作者，还写了《翡翠园》等传奇而已，其他情况所知极少，得此书后，可知他和汪懋麟、李书楼诸人的亲密友谊。而北杂剧在清初尚有完整演出，从此可以略知大概。

我的另一工作就是将明、清两代较著名的《西厢记》评点校刻者、整理改编者的生平事迹尽可能钩稽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当然李卓吾、徐文长、汤显祖、陈继儒诸人用不着我再去介绍，我把五四以来迄未有一人评述过的徐奋鹏、余沪东、张深之等人的间里、经历、著述、交游作了或简或详的介绍。同时考证出《西厢定本》的整理改编者槃荃硕人与《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的徐笔峒均系出于徐奋鹏一人之手，所不同的地方是前者谨严，后者粗俗而已。又何璧此人，赵景深教授已作过初步考证，我在他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步，他也颇为赞许。我认为弄清楚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对他们之所以要评注校刻《西厢记》这一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三人都是正统思想所不容的“异端”。诗、书、画均属高手而又依附严党胡宗宪的徐文长，以发狂终老；李卓吾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自尽；金圣叹玩世不恭，甘冒天下之大

不黷，对孔子不敬而被官府斩首：都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怪物”。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对《西厢记》的高度评价。再说，我原以为毛奇龄是以经学家治《西厢记》，结果这看法并不准确，原来毛奇龄也属“怪物”一族。全祖望在《鮑埼亭文集》中为他立传，说他“平日亦素不持士节，多仇家，乃相与共发其杀人事于官，当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为僧渡江而西……”原来他的言谈行动之怪诞、疏狂与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这三人并无二致，而他论定的《西厢记》三百年来却评价甚高，真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事。看来，封建礼教之所以把《西厢记》视为洪水猛兽，原因是复杂的。他们害怕书的本身，也害怕高度评价《西厢记》的思想家。

现存明刊本与清刊本《西厢记》中存在的异文数量惊人，但缺乏完整的元刊本可以作为校勘的依据。对于某些典故与语词的解释，各种刊本出入亦多。当代的《西厢记》校注本要根据所有明、清善本逐字逐句加以校勘，无论在劳动量、篇幅、技术这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但这些异文是客观存在，这些同一语词、典故的不同注释也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我曾选择若干最主要的异文与注释进行了比较和考证。本书“曲文研究”收入的即是这一部分论文。我花了最多精力的是《“明月三五夜”题解》和《“疑是玉人来”的玉人何所指》。元杂剧《西厢记》问世迄今，没有人认真进行过探索，因此对《乘夜逾墙》所写情节表示难以理解，在研究、欣赏、改编时都进入了误区。

此外，《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与《“颠不刺”为美玉、美女考》两篇，我将例证举得比较齐全，深信对将来的《西厢记》校注者会有较大的帮助。

有关插图的论文四篇，可知《西厢记》对美术的影响既远且深。明代以来，唐寅、钱谷、仇英、陈洪绶（老莲）等著名画家都画了崔莺莺肖像或多幅《西厢记》故事。徽州画派与徽州刻工在刻画方面创作了大量取材《西厢记》的版画，《西厢记》明刊本的插图，特别丰富并非偶然。有的又因此而成为景德镇青花瓷器上《西厢记》人物画的蓝本。无论木刻版画或青花瓷器，在国内固有收藏，在国外收藏更多。这里所评述的，恐怕不够全面，作为一种信息，聊补空白。

又宋元南戏原有《崔莺莺西厢记》，今已散佚，但《九宫正始》、《九宫大

成》诸书中有佚曲，一共是二十八支。加以贯串，情节仍较模糊，但可看出故事、人物均与元杂剧《西厢记》相距甚远。元杂剧《西厢记》在剧本体例上十分接近南戏，但其故事、人物乃至语言均从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而来。因此，我乃作《南戏〈崔莺莺西厢记〉钩沉》与《〈西厢记〉受南戏、传奇影响之迹象》两篇论文，以将此一戏曲史上之奇迹公之于世，以引起专家学者之注意。

今山西永济县郊区之普救寺已因《西厢记》一剧而天下闻名，国内外游客踵至，无不以凭吊当年崔张遗迹而大发思古之幽情。我于1986年秋随《西厢记》专家王季思教授等一起考察了普救寺遗址，都认为董解元、王实甫很可能到过普救寺，规定情景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山西省正在鸠工重建普救寺，其图与模型绘制精密之至，但仍有可商榷之处，即是对清初金圣叹本《第六才子书》过于相信了。因此张君瑞被处理成先居于书房，后居于“别院”，事实上这是金圣叹的一大改动，元杂剧中张君瑞居于西厢，从未搬迁。这样，使我更加觉得有必要写这篇《〈西厢记〉之西厢考》了。即使从今天舞台演出的要求来说，弄清规定情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李渔是戏曲史上既懂得戏曲文学、也对表演艺术精通的兼擅理论与创作的仅有的一位戏曲家，他虽没有《西厢记》评注本问世，但在《闲情偶寄》中有关于《西厢记》的精辟见解，所以我写了《李渔的〈西厢记〉批评》。

以上是四篇相当重要的论文，已收入了此书的“其他”一栏，故略加说明。

我的《西厢记》研究，已故赵景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早的一批成果都是他亲自审阅、修改并推荐发表的。他的指导和帮助一直到他得病逝世之前从未中断。日本的汉学者宿波多野太郎教授把日本有关的资料以及一批《西厢记》影印本赠送给我，为我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少波先生和徐朔方教授二十年来对我的研究工作不断给予支持和鼓励。中国剧协1984年举行戏剧理论著作评奖时，刘厚生先生是评委，他和其他诸位评委对我的第一部《西厢记》版本著作非常重视，并特别请对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周续赓副教授、黄克编审参加此书的评审，最后一致同意给予戏剧理论著作奖，我对他们都衷心感激。

从1979年起，到1996年为止，这十八年之间我将《西厢记》的研究心得体会写成论文共约一百余篇、一百余万字，大部分发表于《中华文史论

丛》、《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以及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诸大专院校学报,还有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季刊》、河北社科院《河北学刊》、山西社科院《晋阳学刊》等学术刊物。就论文的性质、内容而言,以考证版本流变、曲文异同等等有关文献学范畴的为主,约占三分之二,以分析或鉴赏框架结构、人物性格等文艺学范畴的为次,约占三分之一。并不是我在研究上有什么偏爱,只是觉得在文献学方面的功夫多花一些,基础坚实一些,再写文艺学的论文,心中就比较踏实,所以我直到1987年前后,才开始写了几篇稍有分量的理论分析和艺术鉴赏的论文。

现在这一集子是属于文献学的专著,我把曾在刊物上发表过的单篇,重加整理补充,使之在体例上能达到统一,内容上有重复之感的则予以删除,所以可以说是经过一番精心加工的。论文的篇目经过筛选,每篇论文又经过一番手脚,最后得四十余万字。

青年时代对戏曲并没有多少兴趣,只是一般的古典戏曲名著的读者,后来到了戏曲工作岗位上,情况自然有所改变。接着到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山西师大等校兼任教授、研究员、顾问等职务,终于更深入了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觉得这门学问非常宽广,而前人都浅尝即止,许多领域甚至还是空白,我如果半途折返,未免可惜。结果我愈陷愈深,愈走愈远,如今到了白首穷年,还很难说已经弄清楚了多少问题。

但我也不必妄自菲薄,这些论文也介绍了许多一般读者从未能得一见的《西厢记》的善本、珍本,并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与比较,至少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不必再从头做起,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可以少上许多贗本的当。看来,我这辈子既误入“西厢”,有生之年,“乐在其中”,恐怕也很难再下决心走出“西厢”了。

在经济大浪潮之下,学术专著的出版是很不容易的,要没有上海市委宣传部方全林副部长以及上海市文化局诸领导的大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负责同志以及责任编辑同志的帮助和关心,这个梦是不可能圆的。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既十分激动,也有了继续攀登高峰的决心。

1996年6月6日

此《前言》系 1996 年 6 月 6 日初版时所写，如今编入《文集》，考虑到此书系《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82 年）基础上发展而成，篇幅虽有增加，我的研究方法仍有其一贯性，现将刘厚生为《明刊本〈西厢记〉研究》所作序文，作为代序。

2012 年 10 月

目 录

代序	刘厚生
前言	1
版 本 研 究	
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	3
明刊本《西厢记》版本系统的探索	18
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	22
弘治本《西厢记》的体例与“岳刻”问题	27
《雍熙乐府》本《西厢》的辑录与校订	
——评孙楷第《西厢记曲文·序》	37
论徐士范本《西厢记》	44
余沪东氏生平及其校正本《西厢记》	64
李卓吾批本《西厢记》的特征、真伪与影响	70
明容与堂刊本李卓吾《西厢记》对孙月峰本、 魏仲雪本之影响	82